

時和元建本簡直很難區別。以後點劃稍形生硬，圓勁的味道日見消失，看慎獨齋等所刻的便很明顯。

(2) 版式。都作黑口，而且是大黑口，都作雙魚尾，仍多黑魚尾，書名、卷次、頁次在版心的位置和宋元建本相同。四周雙邊或左右雙邊，不記刻工姓名，也同於宋元建本，但已不見書耳，因為這時書冊已通行包背裝而非蝴蝶裝，書耳失去了作用。

(3) 有時在正文的小題或卷次之上加個魚尾，以期醒目，和元建本的做法相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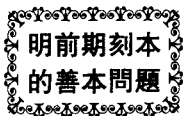
(4) 少見刻書的序跋題識，而多有牌記，這也和元建本相同。

(5) 不避皇帝的名諱。

(6) 紙張多用竹紙，不用當時通行的白棉紙。

(7) 原裝應是包背裝，但多已改裝。

明前期的建本還不見有用後來的本子冒充的，因為清代沒有人覆刻它，仿刻它，沒有近似的本子可用來偽造。而用這明前期的建本來偽造宋元本的事情倒是有的，如前面所說的葉氏廣勤堂刻《萬寶詩山》，就不止一次地被後人用來冒充宋刻本。



先說校勘的善不善。對明前期所謂明初本的校勘問題，前人很少提到。清初孫慶增《藏書紀要》說“洪武、永樂間所刻之書，尚有古意”者，也多半是指其黑口趙體字和元浙本還相近而言。我自己在這方面並沒有多少發言權。我在這些明初本中只校過《四部叢刊》影印的成化時北監刻《山海經》，是用《古逸叢書三編》影印的南宋本和它對校的，發現兩者都只間或有點小錯誤，總的來說都可算是校勘性的善本書，和前面講過的那幾種謬訛滿紙的宋元本不可同日而語，但其他的官刻、家刻、坊刻質量如何就不甚清楚。按常情來估計，明初本包括建本中凡屬時人詩文著述

的初刻者，應該校勘得認真像樣是善本。官刻中的內府本，以及司禮監刊刻的官書，也不致馬虎草率可算善本。但司禮監刻了為宦官閱讀用的經廠本《四書》、《通鑒節要》之類，就只會是通行的俗本談不上校勘價值。建本中的經史讀本也是如此。地方官刻的書帕本則如前所說，有好有壞，壞的惡本當已淘汰。

從文物角度來講，還是物以希為貴。所以到明末清初這些明初本和建本已經見珍於藏書家，看書上鈐有某些大藏書家的印記便可知道。到清代中期，到清末民國初年，所謂明初本的聲價就更高。陳乃乾在《上海書林夢憶錄》中說民國初年買書者的情況是：“開卷之前，必先問棉紙乎抑竹紙乎？黑口乎抑白口乎？”“但得棉紙印者必是佳書，黑口者當然更佳。”這棉紙黑口書就是所謂明初本。周越然在《購書的經驗》裏也說：“至民國二十年左右，明初小字本，清初精刻本，價較十年前約大十倍，且稀見如鳳毛麟角。”時至今日，凡明前期刻本不論其為黑口白棉紙明初本或建本，其一律成為文物性善本，自亦在情理之中了。

第二節 明中期即從正德 到隆慶的刻本



明刻本到這個時期起了一次大變化。變化的最顯著之點，即字體由前此的趙體突然改換成整齊的歐體，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變成了白口。這個變化始於正德，劇於嘉靖，下及隆慶，其中尤以嘉靖時所刻的數量既多，質量又高，成為明刻本以至我國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，“嘉靖本”也隨之成為了版本目錄上的專用詞語。20世紀二十年代藏書家鄧邦述編刻他的《群碧樓善本書錄》和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，就都把“嘉靖本”專門編成一卷，而其他明刻本另成一卷不與混淆，說明嘉靖本在藏書